

杭州灵隐寺与中日文化交流

骆寄平

灵隐寺又名云林寺,位于杭州飞来峰下、天竺山麓。初创于东晋,发展于五代,兴盛于南宋,迄今已一千六百多年,是杭州最早创建的一座禅寺。它历史悠久,建筑宏伟,僧侣众多,高僧辈出,石刻精湛,景色幽邃,驰名中外,很早就列为江南禅院“五山”之首(当间禅院有五山十刹之说),是广大佛门信徒和旅游者向往的朝拜圣地和游览胜境。

灵隐寺与外国的佛事交流,也有悠久的历史。东晋印度高僧慧理来杭州创建寺后,从此,高僧参学,和尚取经,中外佛门信徒友好往来不绝。其中特别与日本的交往,尤为频繁。

隋唐年间,日本派使者、高僧来中国留学、取经,据有文字记载不下十五次,其中人数较多的有三次。玄宗开元四年(公元716年),来华五百五十七人;开元二十年(公元732年),派来五百九十四人;文宗大和八年(公元834年),来华六百五十人。这些使者、学者、高僧、佛徒来中国访问,其中大多数都到过灵隐寺,回国后把中国佛教的各宗派,灵隐寺的禅宗教义,介绍给日本宗教界,对日本佛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

五代吴越、南宋时期,朝廷崇奉佛教,促使杭州佛教事业的兴盛。大批外国使者、佛徒来杭州访问。拜谒灵隐寺,参学高僧。每年正月朔旦,大朝会后,朝廷总要陪同诸国使者拜佛烧香,游览灵隐、天竺一带胜地风光,这时期的灵隐寺,规模宏大,居杭州四大丛林之首,声誉日隆,驰名海外,因此外国佛徒慕名前来者众多。日本僧侣也纷纷来寺拜谒、求教、取经、留居,短则数月,长则三、五年,佛事兴盛,达到顶峰。宋孝宗乾道七年(公元1171年),日本名僧觉阿与其弟子金庆来灵隐寺,拜瞎堂慧远方丈为师,在灵隐寺修学。公元1175年返回日本。离杭时,觉阿禅师赠慧远住持水晶降魔杵一根,念珠二串,彩扇一把。觉阿归国后,信仰禅宗,当时高仓天皇得悉其高风,曾召入宫中,垂询禅宗要义,引起日本佛教界的极大注意。淳熙十四年(公元1187年),日本高僧明庵荣四第二次来华,拜灵隐寺住持瞎堂慧远禅师为师,又去天台山万年寺学禅,此后往宁波天童寺承续法统,宋孝宗赐号“千光法师”。公元1191年回国,接受平政子,源赖家的皈依,受到日本朝野的尊敬。他在京都修建仁寺,为建仁寺开山祖师,后又开镰仓寿福寺,大力宣扬禅风,为日本禅宗的倡始人。宁宗庆元五年(公元1199年),日本名僧不可弃俊芻曾来杭州灵隐寺、余杭径山寺取经多年,回国时,在杭州购买大批佛经、书籍与儒学名著,回国后,创建京都泉涌寺,重兴律学,为日本律宗中兴之祖。宁宗嘉定十六年(公元1223年),日本高僧道元来华,经灵隐寺,挂锡宁波天童山景德寺,再访阿育王山广利寺,又归天童山长翁如净,得印可、衣法、顶相、嗣书等,受曹洞宗正脉。公元1227年回国,先在山城草开创兴圣寺,又建永平寺。当时嵯峨天皇授予紫衣,封号“大师”,立曹洞宗,为日本曹洞宗高祖。据《中日文化交流史》载述,这时期日本高僧来杭州灵隐寺谒拜的还有园尔辨园、无关普门、寒岩义尹、约翁德俭、荣尊、法心、了心、湛慧、湛海、敬念、觉心、静照、慧云、义介、绍明、帷山、尔然等人。据中国史书记述,宋宁宗嘉定八年(公元1215年),灵隐寺僧德明,从山中误采“奇菌”煮食,毒死十余人,当时正在灵隐寺取经的日本东京光胜寺僧定心,亦不幸死亡,此事日史中亦有记述。

元代中日佛事往来,仍络绎不绝,拜谒灵隐、天童、天目山等名刹的日本国高僧、大德和尚众多。成宗大德九年(公元1305年),日本高僧德见法师来华参拜灵隐、天童、径山诸寺,正值沿海倭寇焚劫宁波,被嫌疑扣捕,送关洛阳白马寺,后释放,在中国住了整整四十五年,于公元1349年回国。大德十一年(公元1307年),日僧友梅幻空法师,历访中国名山大刹,拜谒灵隐寺后去湖州道场山万寿寺,途中疑为间谍,关押于湖州狱中,又流放西蜀,后赦放。元文宗即位,请他住长安翠微寺,赐法号“宝觉真空禅师”,公元

1329年回国,创建法号寺,还在京都万寿、建仁诸寺修行。泰定三年(公元1326年),日僧契阇法师历游灵隐、净慈、天台山等名刹,参谒诸长老。一日,游钱塘江被疑为日本细作,捕送武昌,后释放,回国后住持武藏的瑞应寺、骏河的清见寺。至正八年(公元1348年)和至正二十三年(公元1363年),日本名僧无我首吾,二次来杭州,参拜灵隐寺长老,历访禅风,后明太祖闻其德风,召见问法,赐以紫衣、珊瑚念珠和“菩萨”称号。元代,前来拜谒灵隐、径山、天目山诸寺的高僧,有记载的还有祖雄、居中、宗己、元晦、大智、明千、本净、印元、天觉、宗然、园旨、玄素、慈均、妙在、道皎、景印、宗可、园明、一清、周茂、海寿等数十人。

明、清时期,日本国佛徒来灵隐寺人数迅速增加。太祖洪武元年(公元1368年),日本高僧中津绝海、良用汝霖、中恕如心等长老,先后都参谒过灵隐寺,并到各地名刹取经,蒙受明太祖的接见。绝海禅师公元1378年回国,在阿波开创宝冠寺,后去京都住持相国寺等。洪武中叶时期,日僧权中中巽在杭州中天竺寺作藏主,常在灵隐寺设座讲经,于公元1373年回国。

历代日本僧侣来灵隐寺参谒的同时,灵隐寺的大德也去日本弘法,频繁的交流,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。如:兀庵普宁(公元1197—1276年),自幼出家,曾任灵隐寺首座。宋理宗景定元年(公元1260年),东行去日本,先到博多圣福寺,转京都东福寺,会见园尔法弟,后又住建长寺,倍受日本僧俗崇敬。公元1265年留有一偈:“无心游此国,有心复宋国。有心无心中,通天路头活。”返回祖国。大休正念(公元1215—1289年),温州永嘉人,在灵隐寺出家修行。宋度宗咸淳五年(公元1269年),被请东渡日本,住持禅兴寺,又历任住持诸大名刹,开创镰仓的净智寺,后在正规寺园寂,谥“佛海禅师”。无学祖元(公元1226—1286年),浙江鄞县人,俗姓许,在杭州净慈寺出家,又向灵隐寺的石溪心月禅师参学。宋祥兴末年(公元1279年)五月去日本讲学,住建长寺,大力宣扬禅风,并开创园觉寺,为该寺开山祖师,谥号“佛光国师”。明极楚俊(公元1264—1338年),浙江宁波人,俗姓黄。出家苏州灵岩寺,后入灵隐寺学经。元文宗天历二年(公元1329年)与竺仙梵仙同去日本,受天皇召见,宫中问法,诏命住持南禅寺、建仁寺,后去兵庫县创建广严寺,影响甚广。竺仙梵仙(公元1292—1348年),浙江宁波人,号来禅子,在灵隐寺受戒,与明极楚俊同去日本,住持净妙寺、净智寺,又在三浦开创无量寺,后又奉诏住持南禅寺、建长寺等。

此外,灵隐寺与印度、暹罗(今泰国)、交趾(今越南一带)、真腊(今柬埔寨)、阇婆(今爪哇一带)、三佛齐(今苏门答腊东南部)、高丽(今朝鲜)等国都有佛事往来。

(上接第107页) 变化、自然环境、经济活动、生活节奏的变化,出现某类犯罪活动增多或减少的现象,我们称之为犯罪季节性规律;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地区性差异,出现沿海交通发达地区商品经济发展较快,内地交通不便的农村、山区经济相对不发达,使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相差悬殊,犯罪活动呈现一定的区域性,我们称它为犯罪的区域性规律;由于社会变革、经济发展、社会政策和自然灾害带来经济不稳定以及社会控制力的变化,在较长时期内可以发现犯罪活动的周期性变动,我们称之为犯罪周期性规律。犯罪活动的规律具有系统性,它是由许多子系统组成的,有以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自然灾害影响犯罪规律,有犯罪活动本身固有的犯罪类型、犯罪方式、犯罪手段等规律;就犯罪类型研究,有盗窃、抢劫、强奸、诈骗、凶杀等犯罪活动规律;而盗窃犯罪活动,又有扒窃、“白闯”、盗包、撬盗保险箱等犯罪活动规律,等等。我们发现和掌握了犯罪活动的规律,就能针对性地采取预防和控制犯罪的对策,既可以有操作性,又有良好的社会效果,这就要求我们加强犯罪理论研究。

(作者系浙江省犯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)